



20年,110余期,14000多张图片……昔日私人的珍藏,借一部杂志书得见天日,成为全体国民的记忆。“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并配以翔实、活泼、意味隽永的文字,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一切如旧,历久弥新,20年来,《老照片》主编冯克力一直坚守着。

《老照片》：当历史可以观看

□本报记者 张九龙



▲1962年河北蔚县白乐公社全体干部的合影

◀上世纪初烟台祖孙三代合影

家藏老照片

小人物勾画大时代

几年前,曾有人给《老照片》写下这样的评语:“十余年来,不断出版的《老照片》以朴素而温情的独特方式,记忆和见证历史,使我们得以在过去朦胧的霞光中重新想象遥远的过去,重新认识和反思切身的社会生活。”在《老照片》主编冯克力看来,这段话非常很好地概括了《老照片》的特点,也道破了编辑这一套书的初衷。“一方面是怀旧,对过去生存状态、生活经历的回忆和描述,同时,还有对当下生活的反思。”初冬,冯克力在他的办公室这样向齐鲁晚报记者介绍。

1912年,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一名27岁的年轻人在剪掉自己的辫子之前,先去照相馆拍下了一张照片。清末民初,除旧立新,剪辫子代表着与旧时代彻底划清界限的态度,几乎没有可讨价还价的余地。

照片中的这名年轻人为了记录这个瞬间,专门去照相馆,把身后的长辫子拍了下来。拿到照片以后,他还在照片背面写下这样一句话:“壬子秋八月,将欲剪发,故用大镜照后影,以留纪念,拍于劝业场楼上照相馆,计印两张大洋八毛。”时间、地点、原因、费用,都与那条长辫子一起,定格了下来。

选择留影纪念,对当事人来说,这一刻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一百多年前,照相还是稀罕物,花八毛大洋并非小数,如此郑重其事,表明照片主人公对剪辫子的态度——他对自己的这条辫子多少有些眷念,即使要剪掉,也要找个形式,把它留下来。

这张照片刊发于《老照片》第12辑,静下心来再看那时的风云激荡,是不是有了更多滋味?



1912年,一位年轻人剪辫前在照相馆留影

对当时多数普通老百姓而言,政治之外,剪辫子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挺难的。“因为他的父亲、爷爷,是脑袋后面有条长辫子生活过来的,从小他脑袋后面就留着这条辫子了。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可能每天都要打理一下,洗一洗、编一编,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这个东西要发生变化了,他需要适应。”冯克力进一步指出,这张照片有助于我们更客观、更全面地理解一般老百姓对于整个时代变化的态度,也是对一些日常生活发生改变时的态度。

彼时,当事人不会想到,这张照片会有如此意义。如冯克力所言:“这张照片如果不拿出来发表,依然在他家里放着,就永远不会进入我们的历史叙事。而看到了这张照片,就为我们重新认识或者更全面地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参照。”

一张照片往往能反映一个社会、一个时代,若干年后更显珍贵。在冯克力眼中,摄影术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同时它也改变了人们认识和看待历史的方式,从此历史可以被观看。“与文字的叙述不同,照片所定格的历史,是直观而全息的。所谓‘全息’,意思是机体的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缩影,贮存着整个物像的全部信息。”

平民家族故事

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

作为山东本地的品牌图书,《老照片》里不乏齐鲁风物。其中,有一张摆拍而成的照片令冯克力印象尤为深刻。

这张照片拍摄于二十世纪初,是烟台一家祖孙三代的合影。照片在拍摄时,明显经过了精心设计:人物面前的案几上,左右两边分别放置着代表新式生活的煤油灯和闹钟,中间则摆着水烟袋、紫砂壶和一对青花小碗,整张照片的信息量很大。

所谓摆拍,就是摄影师根据自己的设想,创设一定的环境,设计一定的情节,让被拍摄者摆出造型。在这个过程中,摄影师往往充当导演的角色。如今在许多人眼里,摆拍是一种艺术加工,不如抓拍的照片鲜活。不过在百余年前,摄影尚属于高档消费,寻常百姓家合影的机会很少,为了留下最美瞬间,摆拍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在乎,所以想留下来。想来主人家中但凡有点时髦或有些品位的物件,都摆到了面前的桌子上。“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再来看这张照片,我们分明要感谢那位精心的‘摆布者’了,正是由于他的导演与摆布,让今天的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个世纪

以前,烟台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细节。”冯克力感慨。

除了私人回忆、情怀,在专业人士眼里,一张不起眼的老照片,往往能成为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比如当时应《老照片》之邀解读这张照片的社会民俗专家,就从放置在桌上的那盏新式的煤油灯,进而联想到美孚石油公司为倾销自己的产品在当时所采取的种种举措,从中读到了更多的东西……有时照片里毫不起眼的一什一物,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经济发展、中外交往和社会变迁的有力佐证。这似乎又印证了美国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那句话:“所有的照片,都会由于年代足够久远而变得有意味和感人。”

过去二十年,这类私密性很强的影像在《老照片》丛书里占了不少篇幅,是《老照片》历久弥新的重要法宝。冯克力表示,《老照片》创办以后一直秉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欢迎各种各样的人到《老照片》来,结合自己家里的老照片讲讲自己的家族史。

冯克力依稀记得,曾有一天,有位叫杨德崢的济南退休工人,到编辑部送一篇稿件。几张旧照片,洋洋数千字,用钢笔写在方格稿纸上。杨德崢对接待他的编辑说,自己活了大半辈子,这是第一次动笔写文章,让编辑老师见笑了。然后心怀忐忑,坐在一旁,眼瞅着编辑翻阅他的稿件。文章记述了他的祖父早年通过经商改变了家庭的境遇,后经新中国工商业改造又遭遇的种种坎坷。文字朴实感人,看得编辑不住称赞写得好。端坐一旁的杨德崢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告诉编辑,直到临来前,他女儿都反对他向《老照片》投稿,说他也没上过几年学,别去丢人现眼。杨德崢说着说着就有些动情:“不瞒你们说,家里的这几张照片和这些事,多少年了,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悠,再不把它们写出来,我自己都觉得难受。”

个人的历史就是民族的历史,也是国家的历史。“我们的正史叙述里面,很难表达老百姓在大时代里的遭遇和感受。平民百姓结合自己的家常老照片,参与历史叙事,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个人行为。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他们个人尊严的一种体现。”冯克力表示。

融入民族记忆

人人都能是历史学家

如果说上面这张照片是由于刻意的布置,才保留了诸多社会信息,那么一些不经意间拍摄的照片,信息量同样不能低估。比如《老照片》刊登过的1962年河北蔚县白乐公社全体干部的合影。

一图胜千言。冯克力解读老照片,有时就像是侦探在破案。据他分析,这张普通的合影,至少留住了以下信息:那时的政府机构十分精简,全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只有十三名干部;办公场所简陋得很,老旧的房屋几近破败,连窗格上贴的也是旧式的窗纸;院子里种着蔬菜,可见工作之余,干部们还要开荒种地,以贴补生计;国家还没有完全从困难时期走出来,照片上的人普遍较瘦,且面有菜色;那时的基层干部年龄都差不多,除一人年龄较大一些外,大都在二三十岁之间;从身后的标语“税收抓漏洞”得知,虽然处在困难时期,经济凋敝,但税收工作依然重要;留分头、穿中山服是那时的时尚;从照片的题款可知,当时已流行使用简化字……

至此,还没有结束。因为照片图文之外,仍有许多东西值得思忖。比如当年为什么要把大家招呼到一起拍下这张照片,照片并没有说明,这里就给合理想象留下了很多空间。“或许是其中有人要调离,临走前拍一张合影,以为纪念,也可能碰巧照相馆的师傅走村串乡照相时,被临时招呼过来,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一种很随机的行为。”冯克力分析。

在他看来,拍摄者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也没想那么多,看看人站齐了,表情端正了,便随手完成了又一次职业性的动作。然而,伴随着相机快门的定格,上世纪60年代中国北方农村基层政权署所与官员的状貌,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到习俗的诸多信息,却不动声色地留在了底片上。冯克力也指出:“对老照片的解读,每个人都会有所不同,但大的方向总是一致的,保持求同存异的价值共识,尽量还原图文背后的真相,是《老照片》所追求的。”

阅读中国近代史,往往通篇都是宏大叙事,这也难怪,百余年来,中国的政治、军事大事件空前密集。可真实的历史并不是干瘪的数字、简单的定义就能概括,它是由一个个有温度、有故事的人构成。老照片恰恰弥补了传统正史的缺憾,给小人物提供了展示自我、传之后世的空间。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有句著名口号叫“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他认为事件的历史与记忆的历史是不同的,“事件存在的事实,不能独立于人的记忆之外,只能存在于人的记忆和意识当中”。领风气之先的《老照片》,天然地成为平民百姓参与历史叙事的平台,那些个人的深刻回忆逐渐融入了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不正是影像史学、公众史学吗?